



LETTERS TO A YOUNG JOURNALIST

媒体的真相

致年轻记者

透视媒体运作的内幕，揭示金牌记者成功的秘诀。
美国资深传媒人带你走上新闻业的成功之路！

[美] 塞缪尔·G·弗里德曼◎著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B 825

41-C,

LETTERS
TO
A YOUNG
JOURNALIST

媒体的真相
致年轻记者

[美] 塞缪尔·G·弗里德曼◎著

梁岩 王星桥◎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体的真相/(美)弗里德曼著;梁岩,王星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4

书名原文:Letters to a Young Journalist

ISBN 978-7-5086-0850-1

I. 媒… II. ①弗… ②梁… ③王… III. 个人-修养-通俗读物 IV. B82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4344 号

LETTERS TO A YOUNG JOURNALIST by Samuel G. Freedman

Copyright © 2005 by Sam Freedm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CHINA CITIC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媒体的真相——致年轻记者

MEITI DE ZHENXIANG ——ZHI NIANQING JIZHE

著 者:[美]塞缪尔·G·弗里德曼

译 者:梁 岩 王星桥

策 划 者: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 版 者:中信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6 字 数:111千字

版 次:2007年5月第1版 印 次: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06-5971

书 号:ISBN 978-7-5086-0850-1/G · 220

定 价:1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奇普·罗赛蒂在2003年就鼓动我写这本书，他坚信我有能力写好这本书。我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是对他的报答。当奇普离开基础书局(Basic Books)后，乔安娜·米勒接手了这个项目。她是一个敏锐和负责的编辑，对我帮助很大。我特别感谢我的另一位编辑，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的爱丽斯·梅休女士，她允许我给基础书局写书。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希望在来年，她能编辑我的书。我的经纪人巴尼·卡普芬格，是我21年的好朋友和支持者，也是我6本书的顾问。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的一些同事在我阅读新闻史和伦理学方面提供了帮助。我要感谢尼克·莱曼、萨拉·巴雷特、琼·克罗思、安迪·塔克尔、约翰·丁吉斯和桑迪·帕德威。我的另外两位大学的同事，迈克尔·夏皮罗和南希·博布罗威兹，他们从《郊外论坛报》(*Suburban Trib*)时就跟着我，提醒我是什么使那段生活那么特殊。爱丽斯·亚历克逊让我了解了叙述性非小说的古典根源，罗赛尔·戈因斯对罗曼·比尔登的技巧有很深的洞察力。15年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一直鼓舞我在教学和写作方面努力奋斗。

彼得·埃德尔曼是个非凡的研究人员。他对这本书投入甚多。这是我们合作的第四本书。我还要感谢卡普芬格事务所的英奇·德·泰耶和基础书局的埃伦·加里森、贾森·布兰特利、卡罗尔·史密斯、伊丽莎白·马圭尔。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辛西娅和我的孩子阿伦和萨拉，他们一直令我心有所依。

30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像你们这么大的年轻人时，我就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报社做记者。就在1975年5月的那个晚上之前，我已经在校报干了五六年时间。我是从初中的校报干起的。在这一年的夏天，我在《信使报》(Courier-News)实习，这是我第一个既喜欢又能拿到报酬的工作。这家报社位于新泽西，他们的报纸日销45 000份。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从来未曾忘记那个夜晚我所感受到的狂喜。

当时，我差几个月不到19岁。我那时甚至没有白衬衫和藏青色夹克。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记得我向父亲借了件休闲装。他比我矮近8厘米，所以这件衣服我穿着不太合身。我的头发向下披散着，留着连鬓胡子，那是我几个月前去俄勒冈旅行时开始留的。当时的我看起来肯定像一个流浪汉。

我拥有对记者这个职业来说十分重要的东西：圆珠笔和速记笔记本。这些东西比我的穿着重要。在上班前，我赶到了《信使报》的停车场。我的工作是从晚上6点半到凌晨2点半。这里没有什么训练和熟悉适应的过程。我拿来我在大学校报工作时的剪报，这让编辑相信了我的业务能力。于是，我就被雇用了。我的工作顶替休假的记者采访当地政府。上班的第一个晚上，我被派到一个叫布兰奇伯格的地方，去采访镇委会。当时的情景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在截稿之前完成了工作，并因

在文章的导语中加进了“assuage”（缓和）这个词，获得了夜班编辑的赞赏。

在我的报道发送完之后，我就有时间观察自己周围的一切了。《信使报》占据了第22大街附近的一幢低层的现代化办公大楼。白色的砖和茶色的窗户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保险公司或家具店。在新闻编辑室，荧光灯照在一排排仿木的桌子和手动打字机上，令编辑室亮如白昼。编辑们在办公桌前坐成一排，用胶水把剪报粘贴在一张纸上备用。废弃不用的稿子会专门装订起来。在编辑的身后沿着墙放着接收通讯社新闻的机器。在两扇旋转门的那一头有排字室和印刷室，这些地方都被结实的、身上墨迹斑斑的印刷工控制着，他们认为记者是一群愚蠢的家伙。狭窄的走廊下面是我们的咖啡馆，那里有六七台投币式自动售货机，里面有用微波炉加热的薄饼。

我实习的第一夜，就对新闻了解了很多，知道这不是《头版》（*The Front Page*）的神话世界。我们不在同一座城市，没人戴着软呢帽，从抽屉里偷酒喝，或喊着：“重写一遍，孩子。”《信使报》原来在新泽西普兰菲尔德的闹市区里。普兰菲尔德是一个小城市，因在这里建了麦克卡车厂（Mack Truck）而发展起来。在1967年，这个城市的黑人突然爆发骚乱，暴徒们把一个白人警察踩死了。因为这个缘故，《信使报》才决定迁移到郊区。

在以后的几周我发现，我所认识的记者中，似乎有一半喜欢报道过去的事情，而另一半喜欢报道现在的事情。有一个叫福里斯特的老记者，为了躲避去采访有关死者的消息而躲在桌子底下；他的同龄人——玛吉，有时就在桌上睡着了，而她的假发就在这时脱落了；编辑菲尔则不停地抽着雪茄……但我不能因为有几个人特立独

行就否定这整个一代记者，因为他们中还有适应现代化大都市的生存环境、具有机敏意识的怀疑论者杰克·吉尔（Jack Gill），中年时期在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①发生命运转变的理想主义者霍利斯·伯克（Hollis Burke），他们不但有经验，还有智慧。

很自然地，我被年轻人的圈子所吸引。这都是些二十几岁、受过高等教育、雄心勃勃的编辑记者。城市版的编辑安·德沃伊（Ann Devroy）戴着有色眼镜读稿，还抽着烟，吃着三明治。调查版的记者萨姆·梅迪斯（Sam Meddis）用他在罗格斯大学写的诗谈论报纸。最后，安成为《华盛顿邮报》驻白宫的记者，萨姆成为《今日美国报》的特约作家，我们那个报社的其他人也去了《巴尔的摩太阳报》、《新闻日报》或《纽约时报》。虽然在那个夏天，这样的目标看起来还十分遥远。

对我来说，一星期挣 130 美元已经足够多了。那时，我出席了一系列市政会议，从区委会、教委会到城市规划委员会。我打电话到一些警察部门，了解每天案件的摘要。因为我和报纸的戏剧评论家很熟，他请我观看了夏季的轮演剧目。我很高兴能成为这个记者队伍中的一员，在去采访之前，一起分享意大利面；在开车回家前，抓紧时间到安伯斯店关门前去喝酒。在那个夏天，那些闷热潮湿的新泽西夜晚从未显得那么富有魅力。

在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在南邦德布鲁克做热点记者的替补。那是座平静无事的蓝领城市。这时，有人打电话给我提供内幕消息。

① 由志愿者组成的美国政府代表机构，成立于 1961 年，该机构的志愿者在经过训练后被派往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服务。——编者注

他说，在河边的小道上有一堆可疑的垃圾碎片。这是那个夏天唯一真实的内幕消息。我开车去那里，发现了一堆一尺多高的垃圾。通过仔细观察，我发现在垃圾下面盖着海绵一样的白色材料，这使我警觉起来。离这里几公里远就是石棉制造商约翰斯·曼维尔（Johns Manville）的工厂。工厂里数百名在职和离职的员工由于吸入粉尘，患了罕见的癌症。我马上就这个发现写了篇报道，这引起了州环境保护部门的重视，派人来检测垃圾的成分。后来证实这堆垃圾中果然有石棉。这是我第二篇引起轰动的报道。那里的业主做出反应，雇了个大学生看管垃圾。大学生坐在一辆马车的沙发上，观察周围的动静。这以后事情的发展，伴随着头版照片，成为了第三篇引起轰动的报道。好几个晚上，当我在报社中走过福里斯特身边时，他总会喃喃地对我说：“石棉，你就是那个写石棉的人。”我搞不清楚他是在表扬我，还是在谴责我。在8月份快结束的时候，我终于懂得了让鲍勃·马利（Bob Marley）吸引住福里斯特是最安全的。没想到，他居然喜欢鲍勃·马利。

我不能说，只有在写这些石棉的文章时，我才下决心做一个新闻记者。早在8年级我自愿做校报的总编辑时，我也许已经下决心这样做了。但是，这段《信使报》的工作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这段经历让我感到，我的工作是有分量的。它让我感到我的确是杰克·吉尔、霍利斯·伯克、安·德沃伊和萨姆·梅迪斯这些人中的一员。我不只是个实习生，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这个夏天，我最后一次的值班结束了。和我实习的第一天一样，也是发送一些市政新闻，等待着新闻发布。夜班编辑查理·纳特（Charlie Nutt）只比我大七八岁，但他做事的样子就像个七旬老人。

在两点半之前，查理不道晚安，是没人敢走的。而对查理来讲，道晚安似乎是极度痛苦的事。好像早几分钟下班就会有懒惰之嫌，就会威胁到我们的灵魂。我注意到他道晚安的时候，总是用单调的语调，眼睛总也不离他编辑的稿子。而我们则像一群蟑螂一样飞速逃走了。但当我度过这个夏天的最后一个美好夜晚时，听到他说“晚安”，我心里反而很不好受。听到这句“晚安”，我很难过，这种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我告诉你这个故事，是因为用它作为开头没有任何坏处。我告诉你这个故事，是因为你要从我这里得到一些忠告，你也应当知道一些给你忠告的人的事。我不能拿有关战争的报道来吓你，教你如何躲避子弹，如何和将军对抗，因为我从未采访过战事。我也不能拿有关白宫内幕的报道来向你炫耀，因为我只是作为游客去过白宫，从来不了解其中的秘密。我写过一些有关贫困、政治腐败和医疗补助欺骗方面的报道，但我不能把自己说成是像韦恩·巴雷特（Wayne Barrett）和洛厄尔·伯格曼（Lowell Bergman）那样的以揭发丑闻为职业的人。我已花费了大量时间探索这样的既不性感也不是很抢眼的主题，我关注的是文化、宗教、教育和移民等问题。如果你让我做出选择，我还是喜欢写不出名的人，而不愿写名人。当我在聚会中或在编辑室和新闻工作者在一起时，如果我偶然碰到他们中间和我一样报道同一事件的记者时，我就感到好像自己做错了事一样。

我也许有和你们一样的经历，至少是在我们这个行业中很普通的经历。我是从一家小报社（《信使报》）跳到中等规模的报社（《郊外论坛报》），再到大报社（《纽约时报》）的。我已写了6本书（包括这本书）。在过去的15年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新闻。我的学生自

己也写了书，为国家公共广播（NPR）、《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全国广播公司（NBC）、《滚石》杂志和《商业周刊》供稿。

通过教学、采访和写作，我不得不考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需要做什么，做一个新闻记者意味着什么。在我的课堂上，在给你们的这些信中，我要把这些思考形成文字。刚到哥伦比亚大学当助教时，我对新闻学能否讲授是抱不可知的态度的。我在威斯康星大学所读的新闻系的课程，可以说是一种浪费。大学的校报《每日要闻》是我的课堂，在校报工作的经验让我受益匪浅。我的老师是校报的编辑和老记者，而不是学校里的老师。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堂课上说，在校报的工作经验有种改变我心灵的力量。在给学生修改文章的过程中，我体会很深。我确信在一个记者的成长过程中，好奇心和严肃的工作态度比天生的能力更为重要。

这些年来，我也逐渐总结出是什么使新闻教育失败。原因就是有一群崇拜英雄的学生，对著名作家所写的战争报道顶礼膜拜。我记得我的新闻班上有一位意志薄弱的学生问我，他是否可以逃课去听戴维·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①的讲座。我说：“就算你去听哈伯斯塔姆的讲座，你也绝不会成为哈伯斯塔姆。”哈伯斯塔姆的第一份新闻工作，是在密西西比州的西点的一家日销量4 000份的报社。现在他七十多岁了，但当他为写书做研究工作时，他还在为一天能进行两次标准长度的采访而自豪。至于我那位逃课去听讲座的学生，我至今还没有看到他的署名文章。

当然，在这本书中，我不会是你的标题编辑，教你怎样去推敲字

^① 美国著名记者兼作家。20世纪50年代曾任《纽约时报》驻外记者。1963年因由西贡发回的新闻报道而荣膺当年的普利策奖，从此声名鹊起。——编者注

句。虽然我希望我所写的东西能指导你如何更好地进行文稿的修改，但这本书的本意并不在于此。它不是一本教科书、一本历史书、一本新闻批评著作，虽然它和这些书有一些共同点。不论是我的还是其他人的书，都不会为年轻记者提供特别的、职业上的指导。这种指导只能从一个有才华的编辑那里获得。我很幸运能走过这段路，我希望你也同样幸运。

那么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我希望我能教给你一个新闻工作者接触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能灌输给你一些思维习惯，鼓舞你去建立职业道德。我整个一生都在平面媒体工作，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有关采编的艺术、正直的品质、好奇心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注的内容，对那些从事广播、电视和网络工作的人也是同样适用的。甚至我想和你谈谈绘画、音乐和戏剧，我很乐意，而且我觉得自己有这个水平。实际上，我确实希望你去学习艺术，它将提升你的文化修养，提高你的生活质量。伟大的新闻记者绝不会只停留在阅读报章杂志、收集新闻材料和收听新闻报道上，而会在文学、电影和爵士乐等伟大艺术中寻找养分和催化剂。

我把你当做我曾经在高中和大学里做过的记者，当做我现在教的学生，当做我当初第一次工作时的年轻同事。我还记得那种渴望、那种雄心壮志和对提升自我的渴求。我渴望成为杰出和卓越的人，我也只愿意教这些追求卓越的人。我有时在被激怒的时候会告诉我的学生，“我严肃地对待你的作品，问题是你自己是否严肃地对待你的作品”。我承诺，如果你把事情做好了，我会高度地赞扬你。我把我看成你的长者，而不是你的上级。我所获得的东西大部分来自我的失败，而不是我的成功。我将把我犯过的错误一一指给你。像我

熟悉的一位牧师对他的教徒所说的那样：“教堂不是圣徒的博物馆，它是罪犯的医院。”

我欢迎你的加盟，我也被你的专注所感动。最后，我要你相信，像我所相信的那样，你已经选择了一个重要的、有价值的职业，一个不需要难过的职业，一个能使你快乐的职业。

激进的传统

在 1975 年夏天，我还没有意识到报纸文化很快就要消逝了。打字机、胶水瓶、自动收报机、莱诺整行铸排机、收藏着装了封皮的剪报的资料室、午报，所有这些东西在你们看来肯定都是不熟悉的。就像《圣经》所载的大洪水以前的人，就像“头版”时代对我一样。几年前，当我开车载着我们全家从一个感恩节宴会上回家的时候，我的儿子催促我给他买尖端的（也是昂贵的）电脑产品。我拒绝了，他就对我说：“你老了，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我的女儿喜欢用力拽我胳膊上开始松驰的皮肤。我有了灰白的头发，戴着双光眼镜。但是，当我打字时，我发现我的手清瘦、强壮有力，似乎写作使它们充满活力，尽管我身体的其他部位都已老化了。

所以不要期待我能关注这个时代时髦的采访设备。我体验过 8 音轨的录音磁带、贝塔录音机和激光视盘。人们常常对时尚评价过高，尽管它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但我关注的是传统。我在浸淫着传统的两个机构中成长起来，这两个机构是《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我所说的传统并不意味着习惯性思维、惯用的套话和为懒惰找借口。我所说的传统就像是你们在马迪·沃特斯（Muddy Waters）和汉克·威廉姆斯（Hank Williams）的歌中听到

的那样，它不一定是古老的东西，而是值得尊敬、经受过考验、持久和真实的东西。

我心中的价值体系是过去那个时代的产物。新闻记者是忠实信息的经纪人，要勤勉地报道新闻。为了准确，要对事实进行核实，要不带偏见和党派意识地写作。就像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他的历史书《发现新闻》（*Discovering the News*）中所表述的那样。美国的新闻实际上是作为相当政治化的、高度自以为是的事业开始的，是今天的博客和脱口秀的低端形式。对 20 世纪初的新闻工作者来说，把他们的工作当做是不受个人信仰影响的对公众的服务，而不是鼓吹式的主张，这是很大的进步。对他们来说，相信自己能够超越自身的倾向，以通过采访获得的东西做出判断，这也是质的飞跃。

在我从事新闻工作之前，这种传统已经风行几十年了，而且已经成熟到经得起挑战。我和我的同事在报社上班时，是在为新闻客观性的理想而工作。而回家后，我们会阅读富有激情的、个人色彩较浓的，甚至带有异端观点的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杂志——处于全盛期的《滚石》、《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纽约》（*New York*）。相比之下，我们的努力似乎是苍白无力的。我们赞成归属的法则，采访一个事件中两方面的人，客观到要尽力去记住他们名字中间的首字母。有时我们认为，如果不告知读者，他们是不会知道任何事的。在《郊外论坛报》，编辑有一个惯例，那就是在觉得特殊和隐晦的词前加上定义。就是在希特勒前，也要加上“臭名昭著的二次大战的独裁者”。

可是，这些日子里，我发现，相比犬儒哲学和腐败主义，这一传统几乎变得面目全非了。正如作家尼古拉斯·莱曼（Nicholas Lemann）

指出的那样，观点性新闻占据了新闻的很大份额。但在博客、广播、网络和有线电视之间，没人想去接受与自己原有的信仰相冲突的事实和分析。我曾听说过有这样的观众，他们不停地只看福克斯新闻频道，以至于福克斯的标识都烙在电视屏幕上了。我们的媒体不再是各种观念交锋的市场，而变成了只容纳两种偏执思想的回音室，美国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代表一群人，空中美国广播电台（Air America）代表另一群人。那种将一天中所发生的事件按照真正的新闻的定义去筛选和分类的信念，已成了左派和右派共同的笑柄。这两派人的嘴里都经常轻蔑地念叨一个缩写词 MSM——主流媒体。在福克斯的冠冕堂皇的口号“公正与平衡”下，它已经成功地把记者这一职业最主要的美德变成了轻蔑的玩笑。

最荒唐可笑的是我仍然记得《纽约邮报》发表纪实性报道的时候。我指的是在鲁珀特·默多克购买《纽约邮报》之前。我不是“伟人创造历史”（Great Man Theory of History）这种理论的信仰者。但在默多克这件事上，他暴虐的本性使当代美国新闻染上了最有害的疾病。他把《纽约邮报》从一家充满勇气的、严肃的报纸改造成充斥着流言飞语和炫耀式新闻的毫无价值的东西。他用《时事》（*A Current Affair*）这样的节目，来打造小报式电视的俗艳风格。他给福克斯新闻频道这个政治活动的化装舞会提供资金。在糟蹋我从事和崇拜的职业方面，没人应比默多克承担更多的责任。即使默多克从右派变成了一个煽动人心的左派政客，我都觉得不会有什么区别。而另一方面，也有足够多的阴谋理论家和职业泼妇在伤害这个职业。

我正指望你们来参加这场战斗。我意识到你们还年轻，不至于认为新闻业会停留在当前的困境。我给你们举个例子，说明新闻业过去

曾被你们掌握，将来也可能重新被你们掌握。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通常是遵从联邦法规的公平法则的。这个法则基本是说，作为自由使用公共电波的交换，政府要求他们在安排节目上努力做到政治平衡，也要求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安排一些时间给公共服务节目。这样做的后果有一些是迂腐的，甚至是可笑的。当我出去推销我的头两本书时，我常常要为摇滚乐电台录完公共服务节目，以便在星期天早 6 点的“垃圾”时段播出它们。

不管有多少缺陷，公平法则和它所代表的新闻敏感性远比已经取代它的东西要优越得多。自从这个法则在 1987 年被联邦传播委员会废除之后，当公共服务的要求在混乱的气氛下无法实现时，大部分商业广播已变成共和党的动员令和灌输机器，连非主流声音的姿态都不愿摆了。除此之外，还要象征性地请几个自由派人士，作为观众的沙袋。（无疑，许多民主党人也希望如法炮制。）

坚信新闻工作不仅仅是迎合偏见是需要勇气的。让你的观点与现实发生冲突，也是需要勇气的。用专业知识承担责任，用你自身来证明新闻工作者不只是建立一个网站，说自己是个新闻记者，也同样是需要勇气的。

我们以后还要谈这些问题。现在我要向你们提出建议，了解传统是值得的。这不意味着每个新闻工作者必须只在主流媒体工作。毕竟，我写了一些文章，我的书中充满主观主义，这要受到日报的新闻栏目的谴责。但我的确认为，传统是不可替代的基础，传统是做事的基础。向窗外张望总比从镜子里看到的東西多，听别人谈话总比自言自语学到的东西多。正如我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迪克·布拉德（Dick Blood），一个著名的、乖戾的、办公室的墙上挂着皮鞭的人，常常对他的学生所

说的：“这就叫报道。有时你应当去尝试。”

我们所处的状态

我希望我能告诉你们，你们正在进入一个欢迎你们、尊重你们，甚至敬畏你们的世界。我希望我能告诉你们，新闻记者总是被视为英雄，就像我在 1973 年上大学时那样。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和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这些英雄，使新闻报道看起来不仅是勇敢的，而且是冷酷的。在我的寝室里，我和朋友们抢着阅读每一期新版的《新时代》（*New Times*），一本连续报道卡伦·丝克伍（Karen Silkwood）^①案的杂志。

就在我给你们写信之前的一个早上，我在翻阅《纽约时报》，看见了一篇题为《对新闻媒体的调查发现，公众普遍不满》的文章，文章报道了公众对媒体的一系列不满。这个调查是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进行的，该调查发现，政治上的红蓝之争已被表现在新闻观点上。调查显示，40%多的共和党人认为新闻机构伤害了民主，54%的民主党人认为媒体对布什总统太温和了。

这些发现是在更可怕的报道《2005 大趋势》（*Trends 2005*）发表了几个月后出现的。调查表明，将近一半的居民说，他们对这些报纸“很少相信或根本不相信”。在 1985 年，只有 16% 的人持这种态度，而在 1973 年，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是 85%。在过去的 10 年中，这个信任度

① 20 世纪 60 年代末，在核电厂工作的丝克伍有感于不合理的工作制度和环境，开始参加工会活动，并搜集核电厂危害公众安全的证据，就在她要将证据交给记者时，她却离奇地死亡了。——编者注

下降了 60%。大部分公众认为，媒体不能把事实讲清楚，甚至带有政治倾向。

我是在尼克松时代进入新闻界的，当时有许多记者被列入了白宫的黑名单。我已习惯了政府和媒体的敌对关系。行政当局制造对自己有利的新闻，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人们用 spin（意指使新闻报道带有倾向性）这个词来形容媒体控制之前，罗斯福就已被指控这样做了。而肯尼迪则曾与新闻界的朋友商量毙掉有关入侵猪湾的文章。但是，在布什政府之前，我还没有见过政府如此积极地暗中干涉新闻界。布什政府通过像阿姆斯特朗·威廉姆斯（Armstrong Williams）这样的假记者，在他的专栏上宣扬布什的政策。通过把一个叫杰夫·甘农（Jeff Gannon）的江湖骗子塞进白宫记者团，在总统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一些扯淡的问题。他们在公共电视系统插入监督人，并试图在公共广播系统做同样的事。联邦大陪审团对中央情报局泄密的调查，导致拒绝披露匿名消息来源的《纽约时报》记者朱迪思·米勒（Judith Miller）坐牢。陪审团还要求《时代杂志》让它的记者马特·库珀（Matt Cooper）来做说明。遗憾的是，《时代杂志》竟然答应了这个要求。

最后，在米勒的消息来源——副总统助理刘易斯·利比（Lewis Libby）的同意下，米勒终于做了说明。现在利比已被起诉做伪证，还有其他的指控。对利比的审讯也是对前来作证的记者的审讯，这打破了这些记者有关机密性的承诺。这些事情加剧了华盛顿与新闻界的紧张关系，这种关系与正常、健康的紧张关系有所不同。今后可能大多数人都不会忘记这些人的名字，但这种猜疑的气氛将使你以后的工作更有难度。

让我们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新闻工作者已为这种悲观情绪提